

戴望舒在香港

盧瑋鑾

前言

戴望舒（戴朝宋一九〇五—一九五〇），這個二十年代中葉就初露頭角，而三十年代已成為極具影響力的「現代派」詩人，在「幻滅感進一步形成為一種絕望的自我陶醉和莫名的惆悵」後①，面對多難的家國，流離的生活，誠實與敏感，終於使他驚醒過來。這種「驚醒」，一方面可體現在他沉默了一段時期，而再度執筆的詩作上，另一方面更清楚反映在他實際行動上。

戴望舒自抗日戰爭開始後，就跟許多中國文化人一般，到這個南方小島來，開始在香港文壇上，用實際工作反映了他對家國民族的熱誠與責任感。但跟許多因戰爭而南來的文化人不一樣，就是他沒有及時離開香港，致使他與香港一同陷於日本人手中。三年零八個月的敵生涯裏，既令他寫出《獄中題壁》、《我用殘損的手掌》、《等待》、《過舊居》等開拓了思想和感情領域的詩篇，但同時，也很不幸，殘損了他的健康和無法避免地在他一生中添了一絲污點。

戰爭勝利後，他依舊留在香港，面臨家庭生活的破碎和淪陷時期的污點留痕，令他生活與感情都受到挫折。雖然他仍站在報紙副刊的編輯崗位上，但在創作方面，幾乎完全停滯了。到一九四六年他離開香港，回到上海，據說是去交代一些自己的事務，在上海教書和養病，但過了不久，他又回到香港來，再從事編輯工作。這段日子，戴望舒是在「浪費和虛耗中度過了」②。直到一九四九年三月，他帶著重病，為了一就是死，也要死得光榮一點」③，就毅然回北方去。

計算起來，戴望舒留在香港前後超過十年頭，佔去他四分之一生命。他在香港的經歷，應該是他重要的片段，可是，歷來沒有詳細的記載。多年來，我能找到的資料，都很零碎，但為了引起研究者興趣，及認識他的人或前輩的記憶，我寫成《戴望舒在香港》一文，其中恐怕錯漏不少，但就是希望藉此獲得指正和補訂，讓戴望舒在香港的歷史清楚無闕，以供現代文學史的研究者參考，填補了空白的一頁。

本文分三章，分三個時期來展示戴望舒的

活動，即：太平洋戰爭前、淪陷時期、及抗戰勝利後直到回國。為了方便學者研究，文中會大量引用原來資料並註明出處。由於本文目的在陳述戴望舒的工作與生活，對於他的作品，不會作分析研究，只另列《戴望舒在香港發表的著作譯作目錄》，好讓在這方面有專長的學者，以後再深入探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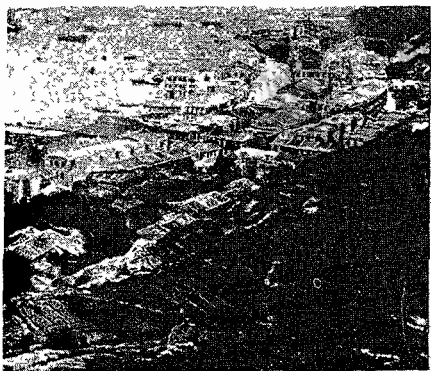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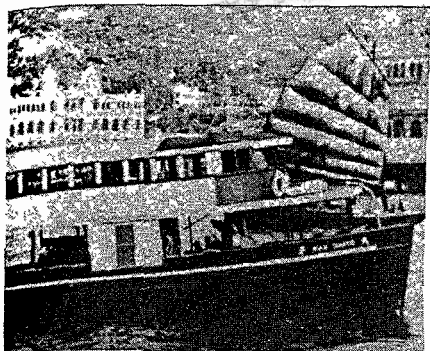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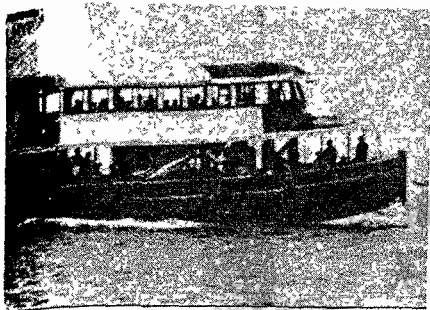
本文寫成，其間得到陳君葆先生（已故）、吳曉鈴先生、施塾存先生提供了極寶貴的資料，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期刊室工作人員給予許多方便，在此謹致深切謝意。



一九三八—一九四一

一九三八年五月中，戴望舒從上海來到香港。本來，他跟許多南來文化人一般，只把香港當成中途站，先把家底安頓好，就轉到大後方去參加抗日工作，從沒有打算久居。可是，一個偶然機會，他就留下來了。他到香港後，住在西區半山的學士台，那地方正是由上海撤退到香港來的文化人聚居之所，先後住在那裏的有卜少夫、徐遲、馮亦代、張光宇、張正宇、杜衡、歐外鷗、袁水拍、丁聰、施蛰存、穆時英等人，「儼然成爲香港的拉丁區」④。

戴望舒居住的房子，本屬香港大學教授馬爾蒂夫人（Madame Marti）所有。馬爾蒂夫人是戴望舒的朋友，她回國去，就讓戴望舒一家住進去，順便爲她看管房子。這房子英文名字是 Woodbrook Villa ⑤，有人直譯爲「木屋」⑥，但戴望舒給它起了一個更中國化、更美的中文名字叫「林泉居」。這座樓房「背山面海，四周被樹木環繞，從路邊到他的家裏，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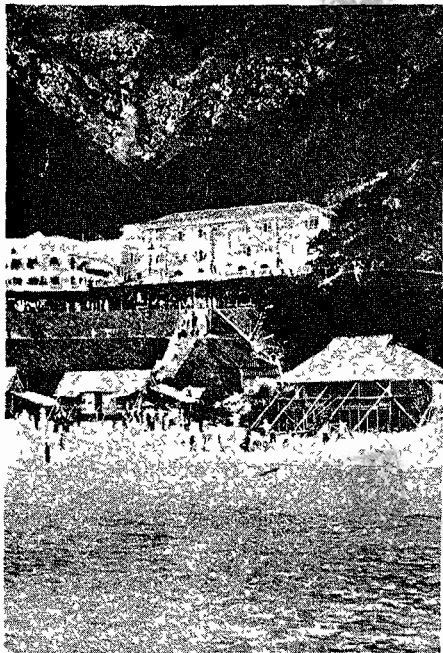
經過一座橫跨小溪的石橋」⑦，詩人正合居於這種幽雅環境中。那時他有一個「安樂的家」，難怪日後他自費印行《蘇聯文學史話》，出版者的名字就用上「林泉居」⑧，而劫後餘生發表的劫中詩作《題壁》、《願望》、《等待》、《墓碑》、《口號》⑨、《偶成》⑩和一些雜文、譯文都用了「林泉居士」和「林泉居」作筆名⑪，正表示他對那些幸福的日子眷戀。當然，我們在《過舊居》和《示長女》兩首作品中，就看到那段幸福生活和林泉居的環境的具體描寫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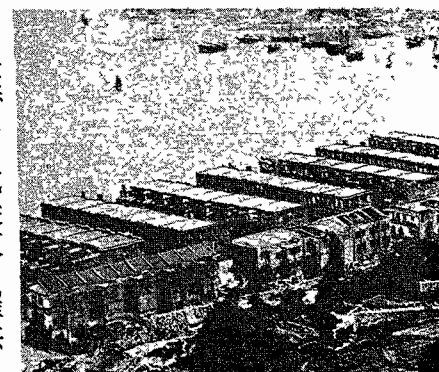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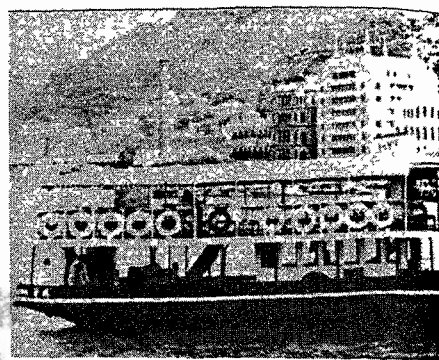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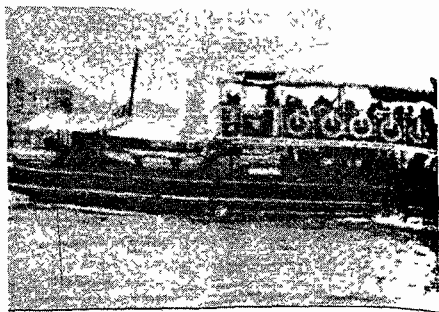
主編《星島日報》、《星島

一九三七年胡文虎本來在廣州籌辦《星島日報》，但因「蘆溝橋事變」，抗日全面展開，他就叫三子胡好把廣州的全部器材及組織撤退到香港來。一九三八年四月，「籌備《星島日報》」的步驟已經到了相當完成的階段⑫，也開始聘定各副刊編輯。五月中，戴望舒到了香港。由於陸丹林的介紹，他就擔任了《星島日報》文藝副刊《星座》的編輯⑬。這是一個

機緣，本來，戴望舒沒有打算長期留在香港，他拿了陸丹林的介紹信，也躊躇了兩天才去見胡好。他考慮了許多問題，最後還抱著「先去看看」的態度去了。怎料當時只有十九歲的胡好給他很好的印象，更完全肯定地接納了戴望舒提出「理想副刊」的意見，於是，戴望舒就把先前訂好的全盤計劃打消，毅然答應下來，而且第二天就開始到館工作。也就如此，訂下他與《星座》的不可割切關係，同時，使這份文藝副刊變成了抗日文藝的重要園地，並爲香港文壇帶來一股清新而健康的氣息。

《星島日報》在一九三八年八月一日創刊，但在正式出版之前，已有許多籌備工作要做，例如組稿問題，他向在國內的作家求稿，更在七月中「曾寫信給西班牙共和國的名流學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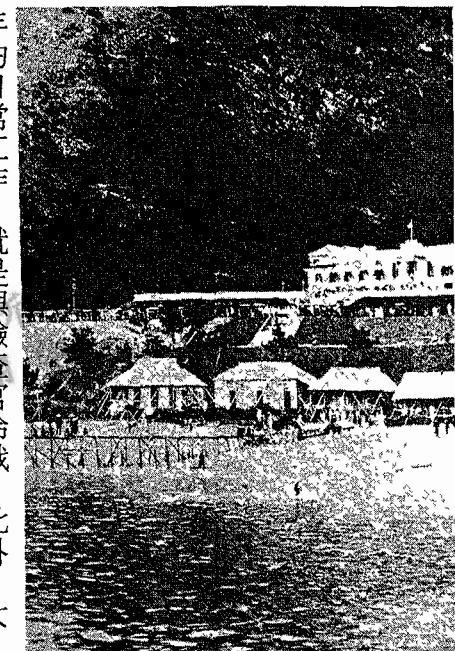




圖上：三十年代的油麻地小輪船

圖中：三十年代筲箕灣的景色

圖下：三十年代之淺水灣海灘景色，背景為淺水灣酒店。



，請他們專為《星座》寫一點文字，紀念他們的抗戰兩週年，使我們可以知道一點西班牙反法西斯戰爭的現狀，並使我們可以從他們得到榜樣、激勵。」^⑭。

他對《星座》的確抱有一個理想，在《創刊小言》中，他說：

「近日陰霾，晚間，天上一顆星也看不見，但港岸周圍明燈千萬，也彷彿是繁星之羅佈。倘若你真想觀星，現在是，在繼續陰霾的氣候，祇好權且拿這些燈光來代替了。……《星座》現在是寄託在港島上。編者和讀者當然都盼望這陰霾氣候之早日終了。晴朗固好，風暴也不壞，總覺得比目下痛快些。但是，若果不幸而還得在這陰霾氣候中再掙扎下去，那麼，編者唯一的渺小的希望，是《星座》能夠為牠的讀者忠實地代替了天上的星星、與港岸周遭的燈光同盡一點照明之責。」^⑮

國內和流亡在港的作家，如郁達夫、穆時英、徐遲、馬國亮、許欽文、蕭乾、蕭軍、蕭紅、

端木蕻良、沈從文、羅洪、蘆焚、沙汀、施蟄存、卞之琳、方敬、郭沫若、艾青、袁水拍、適夷、劉火子、陳殘雲、葉靈鳳、歐陽山、韓北屏、梁宗岱等都向《星座》投稿，正如戴望舒說：「沒有一位知名的作家是沒有在《星座》裏寫過文章的」^⑯。他們的作品真如繁星點點，照亮了香港文壇，打破報紙副刊的沉寂局面。使《星座》成為抗戰文藝重要的據點。我認為研究抗戰文藝的人，絕不能忽視《星座》，該有人作全面而深入的研究，通過它，也可見到戴望舒的貢獻。

《星座》應是戴望舒一手開展的「甚熱鬧有生氣」^⑰的新文藝園地，但並不是說沒有遇上困難。例如，在一九四一年前英國與日本，仍屬「友邦」，為了維持良好國際關係，香港政府對「抗日」行為管制很嚴，特別在報刊檢查方面，設有特別檢查組織，頒給各報刊編輯一份小冊子，說明禁用的字眼——「日寇」、「敵」這些字不能出現^⑱，文章也得送檢，後來禁刊的範圍也愈來愈廣，《星座》就成為全報「檢查的唯一目標」，戴望舒「不得不索興在《星座》上『開天窗』一次」^⑲，以後三

年的日常工作，就是與檢查官冷戰。此外，大機構裏的人事組織，也帶給戴望舒一些煩惱，例如稿費的支收問題，就會使他這個「中間人」十分為難，為了這些事，他曾一再寫信給遠在新加坡的郁達夫，訴說：

「這裏的事什麼都不順手，例如稿費的事，糾葛就發生了不少。編輯部在七月卅一日就把稿費單發下去，會計部却攔到五六號才發通知單，（而且不肯直接寄錢，要等作者寄回收據後才寄）。在本地的作者，竟有領到七八次才領到的（例如馬國亮），不知是沒有預備好還是什麼，今天發一點，明天發一點，最遲竟有等到廿一號才領到的（如葉秋源），使我們感到

異常痛苦，自領的說我們侮辱他們，代領的更吃了那挪用的枉冤，誰知道實際情況是如此。這月底以後，我決定和會計部交涉，得一個妥善的辦法，這樣下去，作者全給他們得罪到了……。」^⑲

在辦《星座》的三年歲月裏，戴望舒拉了不少中國名家的稿，但並不表示他只重視這批成名的人，而疏忽了培養青年文藝愛好者的責任。他熱心誘掖後輩鼓勵他們創作，指出他們的優缺點，然後選好的作品刊在《星座》上^⑳。作品刊出後更「自動把該日的副刊寄給作者」^㉑，這種行動，使曾受他鼓勵的人，數十年後仍念念不忘。

推動抗日文藝活動

一九三九年元旦，戴望舒發表了一首「不僅在主題和情調上，而且在藝術處理上截然不同的小詩《元日祝福》」^㉒，正表示他要從狹小的個人圈子走出來，面對民族的苦難。正如卞之琳說：「抗日戰爭正好來促成戴望舒終於實現了朝健康方向的轉化。」他充滿激情地唱出：

新的年歲帶給我們新的希望。
祝福，我們的土地，
血染的土地，焦烈的土地，
更堅強的生命將從而滋長。
新的年歲帶給我們新的力量。
祝福，我們的人民
堅苦的人民，英勇的人民
苦難會帶來自由解決。^⑳

從詩的技巧上說，這不算是優秀的作品，但它却是詩人向過去消沉人生態度的告別詞。他不止於詩的宣告，在以後三年裏，他全心熱切投身在許多抗日宣傳的實際工作中，不遺餘力推動抗日文藝運動，用行動表現了他對民族的真心祝福，寫下他生命史裏積極的一頁。

一九三九年開始，戴望舒投入繁重的工作中，除了編輯《星座》，五月間，他又與張光宇等合編《星島週報》^㉓，七月間，爲了「使中國新詩有更深邃一點的內容，更完美一點的表現方式……成爲抗戰的一種力量」^㉔。他與艾青合編詩刊《頂點》，以詩歌鼓動抗日情緒。八月間，爲了實踐「文章出國」的口號，加強對外文化宣傳工作，和徐遲、葉君健（馬耳）、馮亦代等主編英文月刊《中國作家》（CHINESE WRITERS）^㉕，這份刊物是以「中華全國文藝界協會香港分會」名義，與重慶總會合作出版的，同時也請了旅港英美文化人，如愛潑斯坦、艾倫等爲顧問，這是頭一個向國外宣傳的文藝刊物，也是老舍認爲值得一提的外文刊物^㉖。

在香港的三年多中，戴望舒與「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」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，而他的許多實際工作也是爲這個會而做的。

一九三八年戴望舒剛到香港，就已很熱心參加「作家文藝座談會」。這時候，由於上海文化界集中在香港，旅港文化界也藉著「作家文藝座談會」的形式，兩周一敘，以求「聯絡感情、互通聲氣，以充實文化界救亡力量」^㉗。戴氏五月到港，在五月二十日就立刻參加了第四次的座談會^㉘。

一九三九年初，戴望舒與樓適夷、許地山、歐陽予倩等被「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」推爲香港分會籌備員^㉙，到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六日，以三十九票當選爲「中華全國文藝界協會留港會員通訊處」的首屆幹事，同時兼任「研究部、西洋文學組」的負責人，《文協》編輯委員。由於《文協》周刊不是獨立發行，必須附刊於本港各大報的副刊中，故戴望舒便得四出奔走，與各報副刊負責人接洽，請求借出篇幅，以便《文協》每周輪次刊出。

戴望舒在以後兩年內，可以說是「中華全國文藝界協會香港分會」的中堅份子。在第二屆（一九四〇年度）理事會中，他佔一席位，同時是「宣傳部」負責人，及「編輯部」委員會委員。第三屆（一九四一年度）再連任以上各職。一九四〇年一月爲了改善低沉氣氛而設立「會務調整委員會」，他又身負重責，努力爲該會籌措事業經費。此外，他任「八月文藝通訊競賽」的評判。在第一次「文藝講習會」負責講授「巴爾扎克研究」，第二次「文藝講習會」負責講授《小說史略》，都是爲了栽培熱愛文藝的青年人而努力。

看他爲「中華全國文藝界協會香港分會」

籌備會員大會、聯歡晚會、一九一〇年一月支持「海燕文學社」出版叢書，一九四〇年三月與郁風、葉淺予等組織「耕耘社」出版《耕耘》，都證明他以積極的態度支持了宣傳抗戰的工作。

在香港，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一年間，政治氣候十分特殊，左右翼文化人的關係微妙——既在統一戰線之下，合作抗日，但骨子裏仍有不斷的暗湧。戴望舒身為「中華全國文藝界協會香港分會」中堅份子，又在文藝界中十分活躍，所以幾乎無可避免周旋在左右文藝界夾縫中。在一九三九年九月十七日，與右翼關係密切的「中國文化協進會」成立，他就與許地山、楊剛同時成爲第一屆理事，及宣傳部主任。據說他又爲了文藝問題，化名寫了許多文章，跟右翼文化人論戰³²。在這種情況下，工作的緊張和繁忙，是可推想的，但他們仍不忘照顧生活困難的文藝界朋友，主動向國內文藝界及滯留香港的文化人拉稿，稿酬從優。一九三九年十一月，更爲援助葉紫遺族募捐而奔走呼籲³³。

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初，香港局勢緊張，日本軍隊已在本港外圍地區密集，但當時的中西文報紙均向政府當局表示，在戰事發生時也絕不停刊，繼續爲市民服務³⁴。由於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，日機已兩度轟炸本港，許多報紙均已減版，《星島日報》也於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日開始把原有的《中國與世界》、《星座》、《娛樂》，及晚報《星雲》各版停刊，改出紙一張，副刊改名《戰時生活》，戴望舒與葉靈鳳、張君幹、梁度孫三人負責合編。這便

是香港淪陷前夕，戴望舒負責的最後編務工作了。

翻譯國地的辯護

翻譯外國詩，是戴望舒重要的工作之一。

這項工作「和他的新詩創作，幾乎是同時開始」³⁵。他精通法文和西班牙文，到香港前，已得到「庚子賠款文化委員會」的翻譯合約，把西班牙塞凡提斯的《唐吉訶德傳》譯成中文。這份工作，不單使他得到部份生活保障，最重要的是他一生宏願在此。到了香港，他在百忙中，仍沒有完全放棄這計劃，據說是：

「有空就繼續譯一點，或者將舊稿整理一下。但是能夠放在這件工作上的時間並不多，所以進展得一定很慢。直到他去世時爲止，他仍在繼續這個

工作。」³⁶

這本書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時已譯成了十分之三，據他自己估計，「全書譯竣，大約尚須兩年」³⁷，到底最後譯了多少？原稿何在？是值得關心追查的。此書一直不見面世，相信是他一大憾事。

在香港，一九四一年前，他的創作不多，集中只見一九三九年元旦的《元日祝福》，一九四〇年五月三日的《白蝴蝶》³⁸，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六日的《致螢火》³⁹，相比之下，他的譯作就很充實了⁴⁰。其中，譯出《西班牙抗戰謠曲選》，表示他決心把西班牙詩人在國家受到侵略時，以反抗心情寫下的動人詩篇，介紹到中國來，而這些譯詩深爲讀者所愛好，

引起了一些朋友的「西班牙熱」⁴¹。

此外，他還念念不忘要把在巴黎旅舍中譯好的一本書完整地出版。這本書原名《俄羅斯革命中的詩人們》，作者是蘇聯的本約明·高力里（Benjamin Gorily），一九三四年巴黎加里馬書店出版。戴氏於原書出版後一個月，就把它全譯出來了。可惜中國出版界沒有人願意出版這書。直到一九三六年他由法國回來，才有機會把此書第一部份付印，由上海雜誌公司初版，但「爲了適應環境，不得不用了《蘇聯詩壇逸話》那個『輕鬆』的題名」⁴²。直到譯成八年之後，即一九四一年，他終於自費以「林泉居」爲出版者名義，把第一部及第二部全本印行。此書中譯本改題《蘇聯文學史話》，是因

「書中所接觸到的不僅是蘇聯的詩歌一方面，而是革命前後的整個蘇聯文壇。」⁴³

這書只印一千五百冊，出版時又已近淪陷前夕⁴⁴，故流傳不多，見者恐怕也不多，葉孝愼，姚明強《戴望舒著譯目錄》⁴⁵也不見此書。

他日要整理戴望舒一生業績，相信翻譯介

紹外國文學這項工作，應佔相當份量。

文學遺產的整理

戴望舒除了致力編輯、翻譯之外，還推廣了中國通俗文學的史料研究。這種興趣，不是到香港後才產生，據施蟄存先生回憶，孔另境的《中國小說史料》一書，多半是戴望舒提供的材料。戴望舒在西班牙看到了一本《風月錦囊》（？），回國後就對俗文學產生興趣了④⑥。他於一九四一年一月四日，在《星島日報》創設《俗文學》周刊，在《編者致語》中說明了目的及取稿原則：

「（一）本刊每周出版一次，以中國前代戲曲小說為研究主要對象，承靜安先生的遺志，繼魯迅先生餘業，意在整理文學遺產，闡明民族形式。」
（二）本刊登載諸家對於戲曲小說研究最近之心得，以及重要文獻，陳論泛論，概不列入，除函約諸專家執筆外，並歡迎各界投稿。」

周刊刊出水準很高的學術論文，作者包括容肇祖、孫楷第、柳存仁、趙景深、譚正璧、吳曉鈴、楊蔭深、羅常培、馮沅君及戴望舒自己。這重要的周刊，一向沒有什麼人提及，但現在已由馬幼垣先生整理全目並考訂別處重出的情況，刊在《馮平山圖書館金禧紀念文集》中④⑦，總算為戴望舒在這時期從事俗文學工作，做了一個結算。加上吳曉鈴編，戴望舒的《小說戲曲論集》④⑧，就足反映他在這項研究上的成就了。

小結

戴望舒在這三年多，負着極繁重的工作担子，朝著他的理想前進。可是，一九四一年十二月，清晨的炮火就把一切都改變了。那天，他例外地在早上就到了報館，由於「適應戰時環境，爲了節省物力」④⑨，《星島日報》自八月九日起改出紙一張，把原有的《中國與世界》、《星座》、《娛樂版》及晚報的《星雲》取消，由戴望舒與葉靈鳳等合編《戰時生活》，在八月十日刊出，這刊物是「在炸彈聲中，兩小時內趕編完成」的⑤⑩。以後的幾天裏，報館在半停頓狀態，人手少了。他再不是副刊編輯，什麼工作都要做，白天冒著炮火到中環去探消息，夜間在報館譯電訊。一直到戰火迫近，排字房工友也散去，報紙被迫停刊爲止，他才離開報館。

自此，他踏入三年零八個月的「災難的歲月」，但他在等待，等待「苦難的歲月不會再遲延，解放的好日子就快到」⑤⑪。

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日完稿

註釋：

①卞之琳：《戴望舒詩集·序》，《戴望舒詩集》，一九八一年一月，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，頁一至九。

②靈鳳：《憶望舒》，《華僑日報》，《文藝周刊》，一二七期，一九五〇年四月十日，四張一頁。

③同②。

④卞少夫：《穆時英之死》，《無梯樓雜筆》，一九八〇年一月，台灣遠景出版社出版，頁二十九——三十五。

⑤據施蟄存先生一九八〇年六月七日來信提供的資料。

⑥葉靈鳳：《望舒和災難的歲月》，《文藝世紀》，一九五七年八月號，一九五七年八月一日，頁八——九。

⑦同⑥。

⑧詳見本文《翻譯園地的耕耘》段。

⑨這組詩發表於一九四六年一月五日《新生日報》頁四的副刊《新語》中，但據《災難的歲月》，（一九四八年二月，上海星羣出版社出版）則《題壁》改爲《獄中題壁》，詩末註明寫作日期是「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七日」。《願望》改爲《心願》，詩末註明「一九四三年一月二十八日」。《墓畔》改爲《蕭紅墓畔口占》，詩末註明「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日」。《口號》詩末註明「一九四五年二月十六日香港大轟炸中」。

⑩《新生日報》、《生趣》，一九四六年一月九日，頁四。在《災難的歲月》中，詩末註明「一九四五年五月三十一日」。

⑪篇目見筆者整理之《戴望舒在香港發表的著作譯作目錄》。

⑫賈訥夫：《星島二十周年史話》，《星島日報》，一九六二年八月一日，增刊十一版。

⑬以下資料多據戴望舒：《十年前的星島和星座》，《星島日報》，一九四八年八月一日，增刊十版。
⑭《編者話》，《星島日報》，《星座》四十一期，

一九三八年九月十日，版十四。

15 《創刊小言》，《星島日報》，《星座》一期，一九三八年八月一日，版十四。

16 同13。

17 適夷：《文藝工作者在廣州》，《抗戰文藝》二卷六期，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五日，頁八十九——九十一。

18 陸丹林：《復刊贅言》，《大風》二十四期，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，頁七三七。文中可見政府嚴禁在報刊上使用的抗日字眼。

19 同13。

20 馬漢茂輯錄：《給郁達夫的信》，《廣角鏡》一一二期，一九八二年一月十六日，頁五十一——六十一。Letters To Yu Ta-Fu-Edited By Hehnut

Martin) 其中收入戴望舒用「星島日報用箋」寫給郁達夫的信，信末只寫「廿三日」，未見年月，但《星座》中，郁達夫共有文章九篇，其中七篇均在一九三八年八、九月間刊出，而信中又提及代領稿費事，推測該信應在一九三八年八、九月發出。

21 馮亦代：《戴望舒在香港》，《海洋文藝》七卷五期，一九八〇年五月十日，頁三十四——四十。

22 鄭官哲：《望舒與〈星座〉》，《星島日報》《星辰》，一九七九年八月十三日，版三十四。

23 同1。

24 《元日祝福》，《星島日報》《星座》一五四期，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，版八。後收入《災難的歲月》中。

25 《星島周報今日創刊》廣告，《星島日報》，一九三九年五月十四日，版一，廣告中見他與張光宇是編委會委員。

26 豐：《新刊評薦——詩的統一戰線》，《立報》，《言林》，一九三九年八月九日，版二。

27 馮亦代：《戴望舒在香港》，《海洋文藝》七卷五期，一九八〇年五月十日，頁三十四——四十。該

文同見於《新文學史料》一九八〇年四期，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二十二日。頁一六四——一六八。文中提及此刊時，年份誤為一九四〇年，其實該刊創刊號於一九三九年八月出版。

28 老舍：《八方風雨》（節錄），《文學運動史料選》第四冊，一九七九年十一月，上海教育出版社。（原刊一九四六年四月十七——二十三日，北平《新民報》。）

29 《港滬文化界籌備舉行聯誼會》條，《大眾日報》，一九三八年二月六日，一張四版。該會並無正式名稱，報上一時稱「作家茶話會」，一時稱「文藝座談會」。該茶話會首次於二月六日舉行，一直維持至一九三八年十月十四日，即第十一次召開後，就不再在報上見到消息。

30 《利周山袖海堂文藝座談會》條，《立報》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一日，版三。文中可見出席的有：陸丹林、簡又文、葉恭綽、穆時英、戴望舒、徐遲等二十餘人。

31 《組織概說》，《抗戰文藝》四卷一期，一九三九年四月十日，頁四——五。

以下有關「中華全國文藝界協會香港分會」資料均散見於各報刊及《文協》周刊中，不再一一列舉出處。

32 同21，筆者於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三十日訪問馮亦代先生，問及戴氏所用化名，可惜馮先生說因年代久遠，已無法憶及。

33 《為援助葉紫先生遺族募捐啓事》條，《立報》，《言林》，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五日，版二。

34 《中西報紙戰時絕不停刊，已向當局表示》條，《大公報》，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三日，二張六版。

35 施蟄存：《戴望舒譯詩集序》，《戴望舒譯詩集》，一九八三年四月，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，頁一一四。

36 同6。

37 《文藝信箱》條，《星島日報》，《星座》一二〇期，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，版八。

38 戴望舒曾以「文生」為筆名，於《新生日報》，一九四六年一月五日，頁四，刊出《小詩》，共五小節，其中第五節，即《白蝴蝶》的第一節。

39 該詩在《災難的歲月》中，註明寫作日期為「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六日」，但在《華僑日報》《文藝周刊》一期刊出，則是一九四四年一月三十日。

40 詳見筆者整理之《戴望舒在港發表之著作譯作目錄》。

41 馮亦代：《海明威和史坦培克》，《大公報》，一九三九年二月二十五日，十二張七版。

42 《譯者附記》，高力里著《蘇聯文學史話》，頁二七三——二七五，一九四一年，香港林泉居出版。

43 同42。

44 該書版權頁中無出版月份，但《譯者附記》文末註「一九四一年十月十七日」，推想可能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頭出版。

45 《新文學史料》一九八〇年四期，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二十二日，頁一七二——一七三。

46 據施蟄存先生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答覆筆者的資料。

47 馬幼垣：《香港星島日報俗文字學副刊全目——附解題》，黎樹添等編《馮平山圖書館金禧紀念論文集》，一九八二年，香港大學書報社出版。頁九十八——一〇八。

48 一九五八年二月，北京作家出版社出版。

49 《戰時生活》，《發刊詞》，《星島日報》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日，頁三。

50 同49。

51 《口號》，《災難的歲月》，頁八十四——八十六。該詩初刊於《新生日報》，《新語》，一九四六年一月五日，頁四。